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集刊AMI综合评价”入库集刊
复旦大学“学术期刊质量提升支持计划”资助立项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Volume 6, Issue 2 (2020)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第十二辑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第十二辑/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编.—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23.12

ISBN 978-7-5012-6702-6

I. ①中… II. ①复… III. ①中外关系—研究 IV. ①D822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227587号

书 名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十二辑 Zhongguo Zhoubian Waijiao Yanjiu · Di-shi'er Ji
编 者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罗庆行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33645(市场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5%印张
字 数	290千字
版次印次	2023年12月第一版 202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6702-6
定 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集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集刊已被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数据（Wanfang Data）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使用费与本集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著作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集刊声明，本集刊将做适当处理。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主管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主办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主编 杨 健
副主编 包霞琴 祁怀高 薛 松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左希迎	中国人民大学	石源华	复旦大学
卢光盛	云南大学	归泳涛	北京大学
包霞琴	复旦大学	关培凤	武汉大学
祁怀高	复旦大学	李皖南	暨南大学
杨 健	复旦大学	杨鲁慧	山东大学
吴心伯	复旦大学	吴寄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日本] 青山瑠妙	日本早稻田大学 (Waseda University)		
周方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赵卫华	复旦大学
赵可金	清华大学	赵青海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赵明昊	复旦大学		
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费 晟	中山大学	夏立平	同济大学
郭 锐	吉林大学	薛 松	复旦大学
魏 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马来西亚] 黄子坚 (Datuk Danny Wong Tze Ken)
马来亚大学 (University of Malaya)

编辑部主任 温 尧

编辑部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 ccmc@fudan.edu.cn

电 话: 86 21-6564 2939

传 真: 86 21-6564 2939

地 址: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文科楼307室复旦大学中国与
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邮 编: 200433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祁怀高 包霞琴 / 1

新冠疫情与周边外交

新冠疫情下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吴寄南 / 9
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周边交往..... 温 尧 / 23

周边国家对华外交

安倍内阁对华政策演变调整的动因分析..... 杨鲁慧 石 敏 / 43
中印关系 70 年——解构印度对华的制衡战略..... 师学伟 沈霜霜 / 69
21 世纪以来菲律宾政府对华政策与菲中关系演变..... 程晓勇 / 87

周边国情研究

中美战略竞争下日本对南亚地区的政府开发援助外交.. 包霞琴 糜 昱 / 107

周边区域合作

认知与共筑：国际社会对澜湄合作机制的意图认知与中国经略之策
..... 张 励 / 127
美国战略界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认知与应对..... 宋 奥 / 146

中国边海事务

-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纳土纳群岛附近水域的捕鱼活动争议及解决方式
..... 雷筱璐 / 173

书 评

- 南海油气共同开发的最新实践:《南海合作开发:政策、障碍与展望》评析
..... 洪 农 / 193

会议综述

- 第十届复旦大学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综述..... 张泽宇 / 207
第四届“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国际研讨会综述..... 贺嘉洁 / 216

附 录

-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简介..... / 225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征稿启事..... / 227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稿件体例及注释规范..... / 229
审稿专家致谢..... / 234

Contents

Preface of Volume 6 Issue 2 (2020).....*QI Huaigao and BAO Xiaqin* / 1

COVID-19 Pandemic and Neighboring Diplomacy

-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ino-Japan Relations under COVID-19
Pandemic *WU Jinan* / 9
-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Neighborhood Outreach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WEN Yao* / 23

Neighboring Countries' Diplomacy towards China

- An Analysis of the Motivation of the Abe Cabinet's Policy Evolution
and Adjustment towards China.....*YANG Luhui and SHI Min* / 43
- 70 Years of China-India Relations: Deconstruct India's Balancing
Strategy towards China*SHI Xuewei and SHEN Shuangshuang* / 69
-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s China Policy and the Evolution of Phil-
ippine-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CHENG Xiaoyong* / 87

Studies on Neighboring Countries

- Jap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Diplomacy toward South
Asia under the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BAO Xiaqin and MI Yu* / 107

Regional Cooperation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 Cognition and Co-construct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Cog-

nition of th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tention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ZHANG Li / 127
U.S. Key Decision-Makers' Perception of and Response to the <i>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i>	SONG Ao / 146

China's Boundary and Ocean Affairs

The Dispute Concerning Fishing Activities Near Natuna Islands be- tween China and Indonesia and Its Solutions.....	LEI Xiaolu / 173
---	------------------

Book Review

Recent Practice of 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Book Review of <i>Cooper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oli- cies, Obstacles and Prospects</i>	HONG Nong / 193
---	-----------------

Reviews on Symposiums

Review on the Tenth Fudan Symposium on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ZHANG Zeyu / 207
Review on the Fourth NACAI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 Jiajie / 216

Appendix

Introduction on Center for China'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 tries of Fudan University (CCRNC Fudan).....	/ 225
Notice Invit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i>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i>	/ 227
Standards of Articles and Annotations of the <i>Journal of China's Neigh- boring Diplomacy</i>	/ 229
Acknowledgements to Reviewers.....	/ 234

新冠疫情下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吴寄南

【内容提要】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导致2020年的中日关系未能延续前两年持续向好的势头。一方面，由于内外各种消极因素叠加，两国间一些结构性矛盾再次凸显，涉华舆论氛围明显恶化。另一方面，中日关系在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也迎来了若干难得的发展机遇。为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亟须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扩大互利合作，从夯实社会基础着手，推动两国关系尽快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关键词】新冠疫情；中日关系；挑战与机遇；企稳向好

【作者简介】吴寄南，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2020年，中日关系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呈高开低走、曲折前行的复杂态势。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干扰了中日关系的正常日程和回暖节奏。两国防控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差异日益凸显，中美交恶的溢出效应以及政局动荡诱发日本少数“鹰”派政治势力搅局的战略盲动，这些内外消极因素叠加，导致长期困扰两国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再次被激化，中日关系呈现停滞不前甚至部分倒退的局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和博弈，推动中日关系重返正常轨道的积极因素逐渐趋于活跃。

本文拟围绕中日关系在2020年出现波折的深层原因及未来如何发展中日关系做一些粗浅的剖析。

一、新冠疫情严重干扰中日关系正常日程和回暖节奏

在2018年、2019年中日两国领导人连续两年实现年内互访，深入开展战略对话后，2020年的中日关系似应顺势而行，继续升温。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却使2020年的中日关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大变化。

（一）新冠疫情导致中日关系失去企稳向好的一大驱动力

2020年，中日关系原本可以迎来一大喜事：预定于2020年在东京举行第32届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这是日本时隔56年、亚洲时隔12年再次举行体育界的这一盛会。中国作为亚洲的体育大国，也是亚洲乃至全世界出境游客最多的国家，届时将有大批中国选手、观众和志愿者前往东京参赛观赛、共襄盛举。这无疑也是提升双边关系的天赐良机。但是，2020年1月下旬骤然发生的新冠疫情导致夏季奥运会、残奥会延期，中日关系由此失去了企稳向好的一大驱动力。

（二）新冠疫情导致两国政府间高层磋商和人员往来“归零”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中日两国间在2020年不仅首脑往来“停摆”，政府间正常的磋商也受到严重影响。线下的高层交流为数寥寥，且主要是中方对日本的访问，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2月28—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访问东京，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村滋进行第八次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其间，杨洁篪还拜访了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另一次是11月24—25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访问东京，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进行了双边会晤。在东京期间，王毅还拜访了时任首相菅义伟、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前首相福田康夫等政要。除此之外，于2月15日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王毅和茂木敏充有过一次双边会晤。9月16日，习近平主席致电菅义伟，祝贺他当选日本首相。9月25日，习近平主席同菅义伟通电话。而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则有4次电话会谈，时间分别是1月26日、2月26日、4月21日和7月29日。

游客互访等人员往来大幅度下降。2019年，中国入境日本的人数创历史最高纪录，为959.6万人次，居各国之首。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在2020年1

月27日暂停了所有的出国团队旅游，日本政府则从2月1日起逐步扩大对来自中国的入境人员的限制。^①2020年1—10月，入境日本的中国人为1032800人次，比2019年锐降87.3%。其中，主要集中在1月、2月、3月，分别为924790人次、87220人次和10365人次。4月以后，中国入境日本的人数骤跌为百余人甚至数十人，还不到上一年同期的1%。^②与此同时，由日本入境中国的人数也大幅度削减。这种人员往来骤然“归零”的状况是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绝无仅有的。

（三）新冠疫情导致中日关系呈“高一低一高”的发展态势

2020年初，武汉报告新冠疫情后，日本在第一时间向中国表示声援和提供援助。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甚至表示要以“举国之力”协助中国抗疫。武汉封城第二天，日本民间捐助的100万只防疫口罩就运来了。东京地标建筑晴空塔特意点亮“中国红”为中国武汉祈愿。这些“暖心”表现在中国国内得到很多点赞。2月、3月后，疫情开始在日本蔓延。这次是中国各省份和民间企业向日本回赠核酸检测试剂盒、防护服、口罩等防疫用品。新冠疫情下，中日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共同印证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句古话，两国民众的心理距离大大拉近。

随着4月、5月后日本的疫情出现“第二波”乃至“第三波”的蔓延高峰，日本国内对华埋怨、责怪的噪声开始逐渐升高。日本一些右翼政治势力本来就对安倍政权近年来改善中日关系有抵触情绪，新冠疫情发生后，他们趁机搅局，大肆炒作病毒溯源问题，渲染所谓的“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围绕中日关系的舆论氛围明显恶化，政治杂音和人为干扰持续不断。两国在岛屿归属、台湾问题和安全保障领域的一些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再次凸显。中日关系呈现停滞不前甚至局部倒退的局面。

时近2020年岁末，中日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重趋活跃。其突出表现是，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11月24—25日访问东京，与日方达成五点重要共识和六项具体成果。

① 2月1日，日本政府首先限制持有湖北省签发护照和14天内湖北省逗留过的人入境；2月13日，追加持有浙江省签发护照和14天内浙江省逗留过的人也将被拒绝入境；从3月9日起停止发放中国公民赴日签证，同时暂停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已发放的签证效力，并要求从中国入境日本的人员隔离两周。中国飞日本的航班只能在成田机场和关西国际机场降落。

② 日本政府観光局「訪日外客統計（報道発表資料）」，http://www.jnto.go.jp/jpn/statistics/data_info_listing/index.html，访问日期：2021年12月5日。

五点重要共识是：第一，遵循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坚持“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精神，增进互信，正向互动，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第二，继续携手抗击疫情，及时交流信息，开展医疗药物方面合作，维护两国民众健康，并为地区和国际公共卫生领域合作共同作出贡献。第三，合作推进两国经济复苏，2021年适时举行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继续加强科技创新、节能环保、医疗康养、电子商务、第三方市场等重点领域合作。第四，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日生效，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及区域合作进程，共同维护和强化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第五，相互合作，支持对方举办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适时举行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会议，疫情结束后全面恢复双边人员往来，扩大地方交流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优化两国关系民意环境。

六项具体成果是：第一，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于11月启动两国必要人员往来“快捷通道”，进一步促进两国复工复产合作。第二，建立中日食品农水产品合作跨部门磋商机制，加快沟通协调，推动该领域合作早日取得进展。第三，建立两国气候变化政策磋商机制，推动气变环保政策协调和务实合作。第四，启动202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并积极考虑将原定于2020年、2021年举办的“中日文化体育交流促进年”顺延到2021年、2022年。第五，在2020年12月举行新一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强化两国外交主管部门和海上执法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第六，争取2020年内开通两国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进一步加强风险管控，增进安全互信。^①

中日两国达成的这些重要共识和成果，为双边关系继续企稳向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中日关系在新冠疫情蔓延中遭遇三大严峻挑战

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

^① 《王毅：中日达成五点重要共识和六项具体成果》，2020年11月24日，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wjbjzhd/t1835081.shtml>，访问日期：2021年12月5日。

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① 中日关系也不例外，它一直是在内外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发展的。这些内外因素中，既有推动中日关系向上提升、与时俱进的积极因素，也有迟滞甚至拉着它倒退的消极因素。两种力量相互冲突、较量，促使中日关系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

2020年，主要有以下三大消极因素或者说三大挑战导致中日关系停滞不前甚至局部倒退。

（一）日本媒体涉华负面报道的发酵恶果

日本言论NPO和中国外文局每年都进行有关中日关系的联名调查。2020年11月最新发表的民调结果显示，日本受访者对中国印象“不好”的比例在连续3年下降后，2020年飙升5个百分点，为89.7%。^② 究其原因，除了日本民众因为新冠疫情蔓延后滋生对华埋怨、责怪情绪，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媒体持续对华负面报道发酵带来的恶果。

近年来，日本媒体对华报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热衷于各种负面新闻的报道。即使是相对而言比较中性的报道，也要加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作为“卖点”。究其原因，除了出于日本朝野对中国迅速崛起的焦虑感、恐惧感，很大程度上与电视台、报社和出版社追求收视率、订户数和发行数的商业化运作模式有关。

这种负面报道长期发酵，导致日本社会对华认识严重偏离客观现实。

2020年11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第16届北京—东京论坛开幕式上提到中日两国媒体“对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和感情互动产生着重要作用，也承担着特殊责任”。他强调要“追求真实”“释放善意”“共创未来”。^③ 这是极具针对性的。还没有迹象表明日本大众传媒热衷于对华负面报道的局面会在短时期内发生根本的变化。如何扭转日本涉华舆论氛围持续恶化的趋势应该是未来一段时期中日关系企稳向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①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78页。

② 「第16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2020年12月12日，言论NPO网站，w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s/9354.html，访问日期：2021年12月5日。

③ 《王毅在“北京—东京论坛”开幕式发表致辞》，2020年11月30日，新华社网站，http://www.xinhuanet.com/2020-11/30/c_1126803486.htm，访问日期：2021年12月5日。

（二）美国政府加大遏华攻势的溢出效应

2020年是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之年。面对疫情蔓延、经济衰退加剧和种族矛盾激化三大挑战，特朗普执政团队为谋求连任而加紧遏华攻势，转移国内视线。这给中日关系的回暖带来不小的消极影响。

从2020年初开始，美国在中美贸易争端、台湾问题、香港国安立法、新疆人权状况、南海“航行自由”乃至新冠病毒的源头等问题上对中国极端施压，无所不用其极，具有无底线、非理性、高频率和强冲撞的特点。日本统治阶层虽有在中美间“两面下注”、左右逢源的考虑，但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最大的盟国，又一向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作为其外交的基轴，在中美交恶的背景下，不能不与美国保持所谓的战略协调，致使中日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

日本政府2018年、2019年分别出台禁令，要求电信企业和政府机构不得使用有安全隐患的通信设备，事实上将中国华为、中兴等公司的产品列入“黑名单”。2020年5月，其又将这项禁令扩大到独立行政法人和指定法人。这项举措距离美国政府再次禁用华为产品不到半个月。这是违背国际贸易准则、破坏中日互信的严重事件。韩国媒体认为，这象征着“日本再次加入美国反华为阵线”。^①

由安倍首相2007年倡议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在沉寂了一段时期后又开始蠢蠢欲动。2020年10月6日，菅义伟入主首相官邸不久，日本就牵头在东京举行了四国外长对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澳大利亚外长佩恩、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印度外长苏杰生参加了这次会晤。据外媒报道，中国问题成为此次“四方会谈”的焦点。不仅如此，美、印、澳三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从11月3日起在孟加拉湾举行了名为“马拉巴尔-2020”的联合军演。

日本《选择》月刊10月号刊载了一篇题为《美国不会让菅政府“蒙混过关”》的文章。文中尖锐指出，以高支持率起跑的菅义伟首相正面临安全保障难题。美国希望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发展成为类似冷战时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对华安保联盟。在对华联盟方面，美国期待日本发挥类似北约中英美的特别作用。菅义伟政府完全没有这一准备，日本夹在美中之间从两头获益的做法

^① 「通信機器調達、安保リスクなら排除独法・指定法人も」，《日本经济新闻》2020年5月27日。

迎来极限。^①

（三）日本“鹰”派政治势力搅局的战略盲动

2020年日本政坛最大的“热点”是首相更迭。安倍晋三持续7年零8个月的首相生涯画上了句号，入主官邸的是草根出身、没有任何派系背景的菅义伟。事实上，由于安倍应对新冠疫情的失误以及用人不当，很早就显露了末期政权的症状，“一强”局面逐渐崩盘，管控能力明显下降。

《朝日新闻》调查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在2020年5月骤跌为5月中旬的33%、5月下旬的29%，创安倍复出以来的最低纪录。^②素以“强势首相”著称的安倍晋三遭遇了执政7年半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安倍周围一些“鹰”派政治家原本就对他试图改善中日关系、寻求在中美间“两面下注”的外交政策调整啧有烦言，但在安倍强势政治运作下难有作为。一旦安倍管控能力下降，甚至挂冠而去，他们觉得翻盘的时机成熟，便多方发难，以求一逞。2020年下半年，日本“鹰”派政治势力搅局中日关系的战略盲动明显增多。例如，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中山泰秀、外交调查会会长卫藤征士郎牵头，炮制了一份针对中国政府决定在香港推行港版国家安全法的决议，表示对香港局势“重大担忧”，并将这份反华决议递交给安倍首相。^③更有甚者，时任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主办的在线研讨会上公开宣称中国对日本“构成安全威胁”，放言要让中国“付出代价”。^④现任阁僚公开宣称中国对日本构成威胁，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还是第一次。日本政坛这些“鹰”派政治家的搅局言行，既是他们右翼根性的本能反应，也有吸引选票、凝聚支持率、为自身进一步上位积聚资本的考虑，给中日关系投下浓重的阴影。

① 转引自《日媒：日本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缘何行不通了》，《参考消息》2020年10月15日。

② 「内閣支持率29% 発足以来最低に 朝日新聞世論調査」，《朝日新闻》2020年5月25日。

③ 《日本党内又起争执！自民党方面拟取消中方访日计划》，2020年7月8日，日本头条网站，www.jpchinapress.com/newNews/20200708/18164.html，访问日期：2021年12月5日。

④ 崔妍：《日防相宣称中国对日安全构成威胁 还就钓鱼岛问题放“狠话”》，《环球时报》2020年9月10日。

三、中日两国在逆境中迎来双边关系的三大发展机遇

中日关系兼具脆弱性和坚韧性的特征。一方面，它具有一些固有的、结构性的隐患，又容易受到外来冲击而出现波折。因而，将中日关系比喻为“盆栽”“玻璃工艺品”毫不为过。另一方面，两国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纽带不会轻易折断，共同的命运和利益也有助于密切相互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既不能过于乐观，也不能过于悲观。在顺利发展的时候要对可能出现的波折保持警惕，而在困难的时候就要坚定信心，善于“危”中寻“机”，化“危”为“机”。

纵观2020年的中日关系，不难发现在回暖进程受挫的同时也凸显了三大发展机遇。

（一）抗疫斗争有助于提升两国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与新冠病毒的斗争是一场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通力合作的严峻挑战。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有着密切的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有共同的利益。两国有影响的政治家多年来一直倡导“命运共同体”意识，但一直没有成为两国的主流思潮。^①恰恰是在新冠疫情这种跨越国境、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肆虐之后，“命运共同体”意识终于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接受，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心理距离。抗疫初期，日本在援助中国武汉的抗疫物资包装箱上写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一诗句。随后，在日本出现新冠疫情后，中方回赠的抗疫物资包装箱上写的是“青山一道，同担风雨”。这些诗句都蕴含着深厚的情谊和鼓舞人心的力量，但更多体现了“命运共同体”意识。

如果说疫情初期中日间主要是防疫用品的互通有无、相互调剂，随着疫情的蔓延，尤其是日本的新冠确诊病例反超中国后，两国间可能更多需要就新冠病理机制及治疗方案进行沟通和知识共享。全世界都在研制新冠疫苗，日本药企在这方面起步较晚，但鉴于其自身的科研实力和技术积累，取得重大突破也

^① 2012年12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外国专家座谈时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系统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翌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随后被载入安理会决议和人权理事会决议。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2018年4月9日在《人民日报》撰文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全世界所有人都幸福，“我举双手赞成”。参见福田康夫：《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所有人都幸福》，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访问日期：2021年12月5日。

大有可期。中日两国有关部门和企业可以在开发高效、低廉、方便使用的疫苗和新冠特效药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两国还可考虑共同为发展中国家克服新冠疫情作出贡献，就像1992年共同参加在柬埔寨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一样。坦白地说，两国民众能相互喜欢、相互欣赏尚需时日，但只要觉得彼此相互需要、谁也离不开谁，就会产生共同维持双边关系稳定的刚性需求，这是推动中日关系持续向好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防控疫情的“时间差”推动两国深化互利合作

与欧美各国相比，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在控制疫情方面做得比较好。中国是最先报告新冠疫情的国家，但从2020年第二季度起，疫情就得到有效控制。本土确诊病例数始终控制在较低水平。日本虽然从2020年的第三、四季度后出现了“第三波”新冠疫情蔓延潮流，但与美国的确诊病例相比，仅仅是后者的1/70。在疫情防控、重振经济方面，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东亚地区与欧美相比有相当明显的“时间差”。这自然有利于中日两国抓住机遇，深化合作。中国的《海关统计》表明，中日双边贸易额在2020年第一季度出现10.1%的大幅度下降，第二季度以后降幅迅速收窄，全年实现0.8%的正增长。^①而且，中国正在加紧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的改革开放力度将越来越大，毫无疑问，这将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难得的机遇。

截至2020年5月，在华日企3.2万家，约占海外日企的43%。新冠疫情发生后，虽然有一部分日企迫于经营压力考虑回迁日本或转移到第三国，但90%的日企看好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肯定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改善营商环境上所做出的努力，愿意继续留在中国发展。^②2020年11月上旬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日本参展厂商超过400家，数量为历年之最，位居参展国首位，参展面积也仅次于美国。日本企业普遍看好率先走出疫情阴影的中国市场。从丰田汽车与中国5家企业合作开发车用燃料电池、日本电装在华投产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案例来看，未来一两年里中日经济合作可望

^① 《海关统计·统计快讯》，中国海关总署网站，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xgk/302275/27999825/3511695/index.html，访问日期：2021年12月5日。

^② 万淑艳：《日本驻上海贸易代表小栗道明：中国营商环境大幅改善》，日本《东方新报》2020年5月30日，http://www.livejapan.cn/home/home_headLines/20200530/27815.html，访问日期：2021年12月5日。

在“量”和“质”两方面得到同步提升。

（三）区域经济合作升温呼唤中日两国“双轮驱动”

当前，世界主要大国围绕全球治理的分歧渐趋扩大，全球化正在出现碎片化甚至部分倒退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合作越来越成为率先走出新冠疫情的国家和地区的最优先选项，重新获得各国的青睐。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15个成员国的人口、经济体量、贸易总额均占全球总量的约30%。《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也是中日两国间首个自贸区安排，堪称历史性的突破。按照这项协定，日本对华出口产品的零关税比例将从8%逐步提升到92%，中国输日产品的零关税比例也将大幅度上升。

在同年11月20日举行的第27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经济合作伙伴发出的中国坚持多边主义，致力于更高标准对外开放的重要信号。日本国内有人对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会不会削弱日本现有的“牵头人”地位存有疑虑。但是，中日两国GDP总量排名分别为世界第二位、第三位，是本区域经济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①再加上两国在维护多边主义、推行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方面有共同信念、共同利益，如果能在更高标准的区域经济合作体制中加强沟通、全面合作，发挥“双轮驱动”的作用，必将惠及地区各国，同时也会给两国自身带来巨大的好处。

四、努力夯实基础，维护中日关系企稳向好的势头

2020年11月24—25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访问了东京，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进行了疫情以来的第二次线下会晤。王毅在东京期间，还拜访了菅义伟首相、二阶俊博干事长和福田康夫前首相。王毅此行向日方传达了中方希望与日方一道，以更加宽阔的视野、更加有效的行动，在更加广泛的领域

^①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中日两国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15个成员国的GDP总量中合计占76%（分别占57.1%和18.9%）。

共同承担责任，积极推进合作，让中日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强烈信号。

中日关系在2018年后重返正常轨道很大程度上源于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决断和积极推动，具有“自上而下”的鲜明特征。但正如“万丈高楼平地起”这句谚语所表达的，建好中日关系这栋高楼大厦归根结底要靠打好桩脚、夯实基础。由于这些年来中日关系伤得很重，两国间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还没有妥善解决，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亟须从夯实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开始，增信释疑，蹄疾步稳，持续发力，与时俱进。具体来说，有以下一些思路可以考虑。

（一）管控对立分歧

自从2010年、2012年围绕钓鱼岛争端的两次风波后，中日间的紧张关系骤然升级。虽然在2014年11月两国达成四项原则共识，日方在承认钓鱼岛问题存在争议这一点上立场有所松动，但仍有一些“鹰”派政治势力不断寻衅生事，进行搅局。前引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的联合调查表明，中日两国受访者都将领土争端列为妨碍双边关系发展的首要原因。2016年的调查结果表明，日本受访者的这一比例是66.6%，比2015年上升11个百分点；中国受访者选择领土争端的比例是65.3%，比2015年的66.4%略有改善。^①领土争端一旦从“潘多拉魔盒”中释放出来，就会刺激民族主义反弹，严重影响舆论氛围。不仅如此，两国的海警局和海上保安厅的公务船以及两国的军机、军舰常年在钓鱼岛周围紧张对峙，稍不留意，就可能出现撞机、撞船，甚至擦枪走火造成冲突。鉴于此，两国一定要尽快落实有关海空联络机制的协议，尽快开通防务部门间的“热线”联络，尽一切可能管控危机、防止冲突。

（二）加强战略沟通

缺乏政治互信，是中日关系最大的“短板”。两国应该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进行直接、坦率的对话，澄清对对方国家战略走向的疑虑，就如何落实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和一系列共识不断“对表”，扩大合作。2020年，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中国国务委员

^① 「第12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2016年9月23日，日本言论NPO网站，<https://www.genron-npo.net/wprld/archives/6365.html>，访问日期：2021年12月5日。

兼外长王毅在年初和年尾分别访问东京，两国高层磋商按下了“暂停键”。在后疫情时代，宜尽快恢复政府间高层磋商。首脑外交历来是引领中日关系的风向标，更是两国加强战略沟通、消除信任赤字的关键环节。在疫情得到妥善控制后，两国宜通力合作，排除人为干扰，为中日关系持续企稳向好奠定政治基础。

（三）促进经济融合

经贸领域的合作一向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两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很强，宜从双方合作较为成熟的领域着手，扩大两国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高度契合。例如，中日两国早就通过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在这一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又不约而同地提出明确的碳中和目标，似宜将节能环保领域作为两国经济融合的优先项目。再如，中日两国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双方在发展养老照护产业方面也有很大的合作余地。此外，数字经济是这次新冠疫情中备受瞩目的新兴行业。两国在物联网、5G网络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可以形成“2.0版”“3.0版”中日经济融合的“亮点”。必须指出的是，两国在2018年10月首届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上已经缔结一系列协定。以“日本运通”为代表的日本物流企业已深度参与“中欧班列”的运营，通过“海陆联运”“空陆联运”架起沟通亚欧两大经济圈的“桥梁”。在亚欧非地区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中，两国应共绘宏图，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实现“三赢”或“多赢”。

（四）推动民间交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民间交流是中日关系的传统优势。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两国间这种交流的渠道逐渐变窄，交流主体老龄化。虽然这些年中国访日游客呈“井喷式”增加趋势，已成为海外访日游客最大群体，但问题也不少。一是两国间游客互访不对称、不均衡现象日益突出；二是旅游活动较多是“蜻蜓点水”式的日程，缺乏与当地民众的深度交流和相互了解；三是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

的亲近感存在着较大的“温度差”。^①这些都是亟须改进的。鉴于日本国内涉华舆论氛围恶化很大程度上与媒体负面报道的持续发酵有关，宜大力推动两国传媒界的交流合作，引导日本媒体摒弃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和偏见，力求客观、准确地传递对方国家的有关信息。后疫情时代，随着入境限制的解除，两国游客互访有可能出现报复性的增长。要落实两国政府有关5年内组织3万名青少年访问对方国家的安排。应重视地方特别是“友好城市”间各种人文交流，努力促进民间交流队伍的“新陈代谢”和“世代更替”，促进民间交流平台的网络化和社交媒体化。此外，还要充分发挥社交媒体在舆论导向上的积极作用。

^① 2019年，中国赴日人数约为959万人次，而日本赴华人数仅为269万人次。见日本外务省网站，<https://mofa.go.jp/mofaj/area.china/data.html#06>，访问日期：2021年12月5日。日本言论NPO和中国外文局的联合调查表明，中国受访者对日本有好感的比例为45.2%，而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的仅为10.0%。参见《第16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2020年12月12日，w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s/9354.html，访问日期：2021年12月5日。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ino-Japan Relations under COVID-19 Pandemic

WU Jinan

Abstract The sudden outbreak of COVID-19 pandemic in 2020 has prevente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from continuing the positive momentum of the previous two years. On the one hand, due to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negative factors, som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once again been highlighted, and the public opinion towards China has deteriorated significantly. On the other hand, although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re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there are also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To build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in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manage differences, increase trust, defuse doubts and expand mutual cooperation. By cementing the foundation of society,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need to be advanced as soon as possible.

Keywords COVID-19;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tability and Positive Trend

Author WU Jinan, honorary president of Shanghai Association for Japanese Studies, research professor of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IS).